

高考奖励性加分项目不是简单的取消,而是改革。取消加分后,这些奖励项目纳入到了高校自主招生和综合素质评价录取的改革之中,进一步引导学生重视个性和特长培养。

取消加分:深化高考改革的问题路石?

■本报记者 王之康

对于高考加分,很多人都不陌生,体育特长生、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科技类竞赛、省级优秀学生、思想政治品德有突出事迹等都是加分项目。而在不久前,教育部下发《关于做好2018年普通高考招生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将这些加分项目在全国性高考中统一取消了。

然而与此同时,奥数、科技竞赛这些“特长”却仍然充当着高校的“敲门砖”,多所高校最近公布的自主招生政策显示,对有竞赛、文学、艺术等特长的学生依然青睐有加;浙江省各院校即将开展的“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对此类考生也提供了较大的政策优惠。

那么,为什么加分项目会在全国性高考中被取消?在教育部发布《通知》的背景下,为什么有的高校却敢“顶风作案”,仍在自主招生和综合评价招生中提出奥数等条件?这样的“矛盾”对于我国高校招生制度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取消高考加分,重公平减负担

说起来,此次全面取消高考奖励性加分在4年前就有了迹象,当时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和《教育部 国家民委 公安部 国家体育总局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关于进一步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目和分值的意见》明确提出,2015年1月1日之后的体育特长生、参加竞赛获奖学生等将不再获得全国性高考加分。

“这是国家严格按政策实施节点推进取消高考奖励性加分的改革。”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因为今年的高三学生都是2015年9月入学的。

而之所以取消高考加分,在熊丙奇看来,则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量。

“一方面是治理高考加分造假,推进高考公平。多年来,高考加分一直遭遇造假质疑,成为舆论焦点。教育主管部门也曾多次对高考加分进行瘦身,但依旧难以杜绝,彻底取消也正顺应了舆论呼声。”熊丙奇说,另一方面是治理“加分教育”,“所谓‘加分教育’,指的是一些学生为了获得加分去上特长培训班,这让特长加分变得十分功利,也增加了学生负担”。

对此,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倪振民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一个国家要搞教育,首先要花最大的努力保证其公平性。教育部作为新政取消高考加分项目,我认为更多的是基于教育的公平性。”倪振民说,在当前,家长既希望孩子发展得好,又希望减轻其负担的情况下,这一新政则倾向于百姓需求,以公平为出发点,以减轻学生负担为坐标,让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尽可能地提高质量而又不增加负担。

事实上,高考加分政策是为弥补高校招生制度的某些缺陷而制定的,在某所高校招生办主任张一洋看来,“它‘本来’是一个积极因素,可以开阔学生视野,让他们不只是一个模式的‘产品’,而是有更多追求和发展”,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变了味儿”,“不仅弄虚作假层出不穷,还慢慢地养成了一种风气,比如‘全民奥数’”。



自主招生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公平性自然也随之受到了影响,而且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学生的负担,最终使这个积极的政策变成了一个功利性的引导。”张一洋有些无奈。

自主招生政策倾斜,实际并不矛盾

既然高考加分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这么多弊端,为什么教育主管部门只取消了全国性高考的加分项目,却并没有对高校自主招生、“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予以明确规定呢?

事实上,当前的情况是,依然有很多高校将其作为选才标准。比如中国科学院大学自主招生的报考条件为: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五大学科竞赛中,获得省级竞赛一等奖以上的考生。再如浙江工业大学将普通学生报考“三位一体”的条件定为考学7A以上,而特长生要求则降低到5A以上。

对此,张一洋认为,其实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加分项目依然是目前90所高校自主招生的重要考虑内容。它是指只要学有所长,仍然可以在自主招生的环节享受到一定的政策优惠,只不过通过加分项目进入高校的学生数量大为减少了,总体不超过5%。”张一洋说,这也就让各类竞赛从一种“全民运动”变成一小部分真正有爱好、有能力的人的项目。

熊丙奇也表示,这样的“顶风作案”实际上恰恰是让各类竞赛回归了其本身的价值。

“国家层面取消竞赛获奖加分,是治理全民奥数。因为获得奥数奖励就可以获得政策性加分,报考任何大学和专业都认可,哪怕特长与专业没有多大关系。”熊丙奇说,因此有些家长送孩子去参加培训,其实只是为了获得加分,而不重视孩子兴趣培养,但大学自主招生关注奥数获奖学生,是由大学来评价学生的特长与其招生要求是否相吻合。

比如一名学生获全国生物竞赛二等奖,按原来的加分政策,将加20分参加高考录取,经经济

学、管理学专业都认可。而高校自主招生则由学校测评其特长,如果这名学生申请经济学、管理学专业,大学就可能不认可该竞赛成绩,而且要进行面试,以了解学生是否真正有这方面的兴趣和特长。只有达到了一定要求的学生,大学才会给予一定的录取优惠。

权力下放高校,有利双向选择

对于《通知》取消全国性高考加分项目,而不少高校在自主招生中依然青睐于招收有竞赛、文学、艺术等特长的学生,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郑若玲认为,没有必要因噎废食,再规定高校自主招生中取消或不取消,因为这些竞赛是高水平的,确实能够甄别、选拔出一些在某学科方面有特长的学生,“权力已经下放给高校了,它们可以自行选择”。

实际上,也确实有高校在今年的自主招生中取消了竞赛、得奖、专利等的优先资格。比如武汉大学。往年,该校在自主招生报名条件上规定,学生在高中阶段获得各类竞赛名次、发表论文和获得专利成果的,享有优先资格。今年则删除了这方面的内容。只是部分全国性竞赛的获奖学生依然有笔试免考的优待。

“对教育部来说,取消了这个引导性规定,不仅有利于消除高考加分可能带来的造假和不公平的负面影响,也可以逐步扭转中小学教育的恶性竞争、过度补习等混乱现象。”郑若玲说,学生对待竞赛也不会像以前那么功利,而是会逐渐根据自己的兴趣发展特长,并以自己的特长选择大学和专业。

而且取消高考加分后,“对于有学科特长、体育特长、艺术特长以及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的学生,高校并不是不再关注,而是通过自主招生和综合素质评价的方式录取并加以关注”。熊丙奇说,

比如,北京大学2018年自主招生简章显示,

数学英才班招收“有志于从事数学研究的普通高中二年级在校学生”,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中国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全国总决赛取得优异成绩者;有数学特长,并在国内外数学专业相关学习实践活动中取得优异成绩者。

“各所大学的发展趋向是不一样的,有综合性的,有工科的,有理科的,也有文科的,更有艺术特色或体育特色的,它们都希望能够招到与自己相匹配、相适应的教育对象,也就是有特长的学生。”倪振民说,从教育学的角度来讲,人天生有其学习的优势,用哈佛大学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的理论来说,就是人有“多元智慧”,也就是每个学生的学习优势都是各有特色的,并不像工厂里的流水线产品。通过自主招生,他们也能够更好地找到适合自己的目标学校。

建立多元标准,还须深化改革

不过,目前我国高校的自主招生仍然和统一高考录取嫁接在一起,自主招生只是给一部分学生录取上提供优惠。因此,它还是被一些人理解为变相的高考加分,导致部分学生、家长和社会舆论以功利的态度对待自主招生,进而以功利的态度对待各类竞赛。

在张一洋看来,这些加分项目在自主招生中只是进入高校考核范围的一个门槛,或者说只是一个参考因素,并不是决定因素。因为最终是否录取一名学生,都是通过综合评价才能决定的,除了关注其一技之长处外,还会关注心理状态、身体状况以及学习状态等。

“高考奖励性加分项目不是简单的取消,而是改革。”熊丙奇说,取消加分后,这些奖励项目纳入到了高校自主招生和综合素质评价录取的改革之中,“进一步引导学生重视个性和特长培养,还要在新高考改革中加大自主招生和综合素质评价录取改革力度”。

张一洋认为,当前的高校招生制度仍然以总分优先,这样,大家必然都要想方设法地去争分。“所以,我觉得应该建立多元录取标准,或者在一定范围内去尝试其他录取形式。”

对此,熊丙奇说得更加明确。他呼吁要给学生更大的选择权,建立学生和高校双向选择机制。“可以在高考成绩公布后,由自主招生高校提出申请成绩要求,达到要求的学生可自主申请多所大学,大学结合申请学生的高考成绩、大学面试考查、中学特长、中学综合素质等进行评价、录取,一名学生可获得多所大学录取通知书再作选择”,学生对待竞赛也不会像以前那么功利,而是会逐渐根据自己的兴趣发展特长,并以自己的特长选择大学和专业。

“由于有统一高考分数做基础,学生和高校双选,只要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完全可以保障这种录取方式的公平公正。”熊丙奇说,先用90所高校的5%名额试点,成熟之后可以增加高校和名额,由此推进高考录取制度改革,基础教育从千校一面办学到多元办学、个性化办学,促进学生个性和兴趣发展。

中国大学评论

“双一流”的脚步近年来不断在推进。2015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2017年9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正式确认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可见,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高等教育建设的一个主要方向就是“双一流”建设。如何保证“双一流”建设方案能够平稳有效地实施,评价和评估是关键。在《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中明确指出:积极引入专门机构对学校的学科、专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建立健全绩效评价机制,积极采用第三方评价,提高科学性和公信力。在相对稳定的基础上,根据相关评估评价结果,资金使用管理等情况,动态调整支持力度,增强建设的有效性。突出建设实效,构建完善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评价体系,充分激发高校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引导高等学校不断提升办学水平。

在这样的背景下,非常有必要对“双一流”建设中出现的评价和评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目前国内有不少学者对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评估与评价展开了研究与讨论。然而对高校的院系进行评估的研究却并不多。因此,非常有必要加强院系评估的研究。

所谓院系评估,顾名思义,是由高校自身主导的,由高等学校对其校内各从事教学、科研的学院、系所或者研究中心的评估。进行院系评估时,高校务必要一直牢记必须和自己的战略规划密切相关,或者说必须在自己战略规划下指导院系评估。

所以,高校第一步要做的是将院系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正在战略发展期的院系,一种是进入了发展平稳期的院系。对于正处于战略发展期的院系,因为学校的期望是中长期的战略发展目标,所以不宜以短期的投入产出指标对其进行评价,而是抱着“让子弹飞一会儿”的态度,让这些院系有更多的自由去开拓进取。对于发展平稳期的院系,高校就要秉持这样一种管理理念,即资源一直是稀缺的,必须将稀缺的资源用于具有良好投入产出效率的院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制度的、定期的、严格的、全面的投入产出效率评估。

接下来,本文大致描述一下针对发展平稳期的院系进行院系投入产出效率评估的大致流程。首先,确定评估投入周期。评估的周期不宜过短,否则院系容易怨声载道,评估结果也容易受外界因素的干扰导致不准确,更为重要的是,这样会人为助长短期行为,而这对于“双一流”建设是极其不利的。

其次,确定学校对院系资源投入的指标。因为是高校给自己的院系进行评估,所以投入只需要考虑学校对院系的各种直接与间接的资源,院系从学校外部获得资源(包括经费、杰出人才的引进等)都应该算院系的产出。具体而言,高校对院系有如下四项投入:

(1)各种直接与间接的经费投入。包括根据学生和教师人头或者比例的定额拨款,比如教学经费、自主科研的项目经费等;资助院系发展的专项经费;减免或者返还院系上交的经费;放权院系进行培训的收入(为什么需要将这部分经费作为学校的经费投入呢?因为如果学校统筹培训,那么院系就没有这部分收入,而且这部分收入本身是利用高校声誉获得的,培训又不是“双一流”的核心业务)。(2)场地。所有用占地面积都是学校的投入,包括办公室、资料室、会议室、实验室等。(3)学生。本科生可以不算学校的投入,但是研究生作为科研的主力军之一,应该算是学校对院系的投入。(4)有事业编制数的教师人数。

再次,确定院系的成果产出指标。那些能够给学校、国家和人类带来知识、声誉与影响力增加的都应该算是产出。建设高校在重要院系的产出指标时,可以借鉴国际、国内重要的大学排行、学科评估的各项指标和自己学校的特色以及战略规划后,确定好产出指标,并且在过程中要分化和院系进行沟通。

最后,挑选合适的评价工具对院系的投入产出进行评估。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已经有了很多不同的评价方法与工具,不同的方法具有不同的侧重。具体采用哪些方法及其工具,同样需要学校和院系进行充分沟通以达成共识。

总之,目前我国要“以一流为目标,以学科为基础,以绩效为杠杆,以改革为动力”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这必然会导致越来越多的高等教育的利益相关方开始关注大学院系层次的评估。高校要根据自身的战略规划与特点,明确院系评估关注的方向,建立评估制度,构建“双一流”院系评估的投入与产出的评估指标,然后选择符合评估目标的方法和工具。最后,高校基于院系评估的结果,制定相应的激励措施,最终促进“双一流”的建设。

做好院系评估 推进「双一流」建设

李锋亮

“建筑要为人服务”

——追记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戴复东

■本报通讯员 艾娇 记者 黄辛

他主持设计的建筑既融合自然、富有人性关怀,又有现代创新之美;他毕生身体力行“建筑是一门为人服务的学问”,在创作中积极探索“现代骨、传统魂、自然衣”;他心系建筑设计人才的培养,主张抓基础、重动手……

他就是著名建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戴复东。不久前,戴复东因病逝世,永远离开了我们。

心怀理念服务他人

“建筑是一项为人服务的学问,建筑师只有真正热爱人、关心人,才能使建筑环境中人服务得更好。”这一理念,早在青年戴复东心中扎下了根。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建筑学专业大学生,戴复东1952年从南京大学建筑系(现东南大学建筑系)毕业后,来到同济大学建筑系任教。从此,他的人生轨迹就与同济大学紧紧连在一起。

上世纪50年代,戴复东曾给上海某高校设计教师宿舍。戴复东在设计中让起居室和餐厅、卧室和工作室的两边都有窗户,形成空气对流。而今,这种设计已成为最时尚的通风设计概念。

他很快在建筑界崭露头角。武汉东湖风景区内一处用于接待毛主席生前工作、居住的“东湖梅岭工程群”,是戴复东年轻时的代表作。戴复东的设计依地就势、就地取材,既好看,又环保,而且富有地方特色。其中一个亮点是地板的图案,戴复东别出心裁地用原木材锯成一块块的木刻板拼装而成,看上去就像置身于森林环境中。

1984年夏天,戴复东获得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以所获普利兹克大奖奖金设立的“在中华人学者奖学金”,成为第一届奖学金的唯一获得者。

他用这笔奖金独自一人坐长途汽车作了环美32座城市的旅行与参观,对其城市、乡村及各方面环境获得第一手资料与感性认识。由此,他对“建筑师要有为别人服务的思想”更加执念于心。

数十年过去,东湖梅岭工程群、同济大学研究生大楼、杭州浙江大学紫金港新校区中心岛建筑群、中国残疾人体育艺术培训基地(诺亚中心)、无锡技术中心科技大厦、安徽芜湖天泰大厦及天泰花园……百余项优秀建筑作品,凝聚着戴复东及其夫人——中国工程勘察院设计大师、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教授吴平生的共同智慧和心血。

不懈探索创作思想

“现代骨、传统魂、自然衣”,在长期的建筑创作实践中,戴复东对建筑创作的认识在不断深化,这些独到的思想已成为他建筑设计和创作中的主导思想和重要指针。

“建筑是生存与行为的人工与自然环境,宏观、中观、微观应全面重视、相互匹配,着重微观。”这是他1985年提出的“全面环境观”思想。他说,人们接触最多、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是微观环境,不但要重视微观环境的设计和创造,同时也要重视宏观、中观、微观各种环境相互有机、互动的匹配。

“我有两只手,一只手要紧紧抓住世界上出现的先进事物,使我不至落后,另一只手要紧紧抓住自己土地上生长的、正确的、有生命力的东西,使我有根,创造条件使二者结合,往前走一步,去创造出有科技内涵、有文化深度、宜人、动人的美好建筑环境。”这一思想在他众多作品中得以彰显。

他在建筑设计及其理论上有着广泛的兴趣,一直密切关注着国外各种建筑的发展动态。其中,包括他最早提出的“缩短护理至病床距

离”,成为国内医院组合设计的最佳标准;他在工程匮乏年代徒手抄写描绘国外最新刊物中的机场航站楼资料,提出的“缩短步行尺度、改进登机制度、提高旅客速度”的机场候机楼建筑设计思想,对我国航空港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提出“要重视高层建筑对环境生活的有利和不利影响,要让人们能够动静有序地看见天空”……

他格外重视乡土建筑与文化研究。在这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山东省荣成市北斗山庄的海草石屋,这一被誉为“化腐朽为神奇”的建筑,将地方传统民居与现代建筑相结合,获国内外赞誉。这也更坚定了他所提出的“在建筑创作上要抓两头,一头是‘根’,另一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理论、技术和技巧,并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的信念和决心。

迈入古稀之年,他还创立了同济大学高新建筑技术设计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开启了轻钢轻板房屋体系及产业化研究开发,也就是“轻型建筑”的开发研究,开展住宅商品化的制作组装修全过程研究,设计出内外墙自封闭体系,使房屋建设向可持续发展、高科技化走出探索性的一步。

1999年,戴复东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6年8月,中国创造学会与国际管理学会联合授予戴复东“中华创意产业大奖终身成就奖”。

孜孜不倦培养人才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戴复东就提出,建筑系应当是“研究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学术与教学机构”,它的任务是“要教会学生能很好地创造适应人所需要的各种环境——场”。环境有自然环境



戴复东

人为环境和具有人工智能的自然环境”。

同样在上世纪80年代,戴复东敏锐地意识到,“建筑技术科学”是建筑教学和建筑学科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主干之一,为此,他在同济大学成立了国内首创的“建筑技术中心”,并相应地筹建光环境研究室及实验室,建造技术研究及实验室,力争将我国的建筑技术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戴复东一直关心、思考着当今建筑设计人才培养。在担任同济建筑系主任期间,他推行了一系列教学改革:将1年的“建筑设计初步课”改为2年的“建筑设计基础课”,将建筑学4年学制改为5年;协助学校建立国内首个建筑类学院,提出“一干三支”,即以建筑设计基础课为“一干”,以建筑、城市规划、风景园林三专业课程为“三支”;同时增设室内设计、工业造型设计两专业,鼓励专业之间的联动,旨在全方位地培养专业人才,让中国的建筑教学体系与先进国家接轨。

在60余年的为师生涯中,戴复东悉心指导培养了大量建筑学专业人才,包括博士后3人、博士生41人、硕士生52人及众多的本科生。2010年10月,中国建筑学会授予戴复东“第四届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教育特别奖”。

“坚韧不拔地追求,执着勤奋地探究,清醒周密地思索,谦虚谨慎地奋斗!”这是这位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的座右铭,也是他人生活的真实写照。